

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

四川系列

国学论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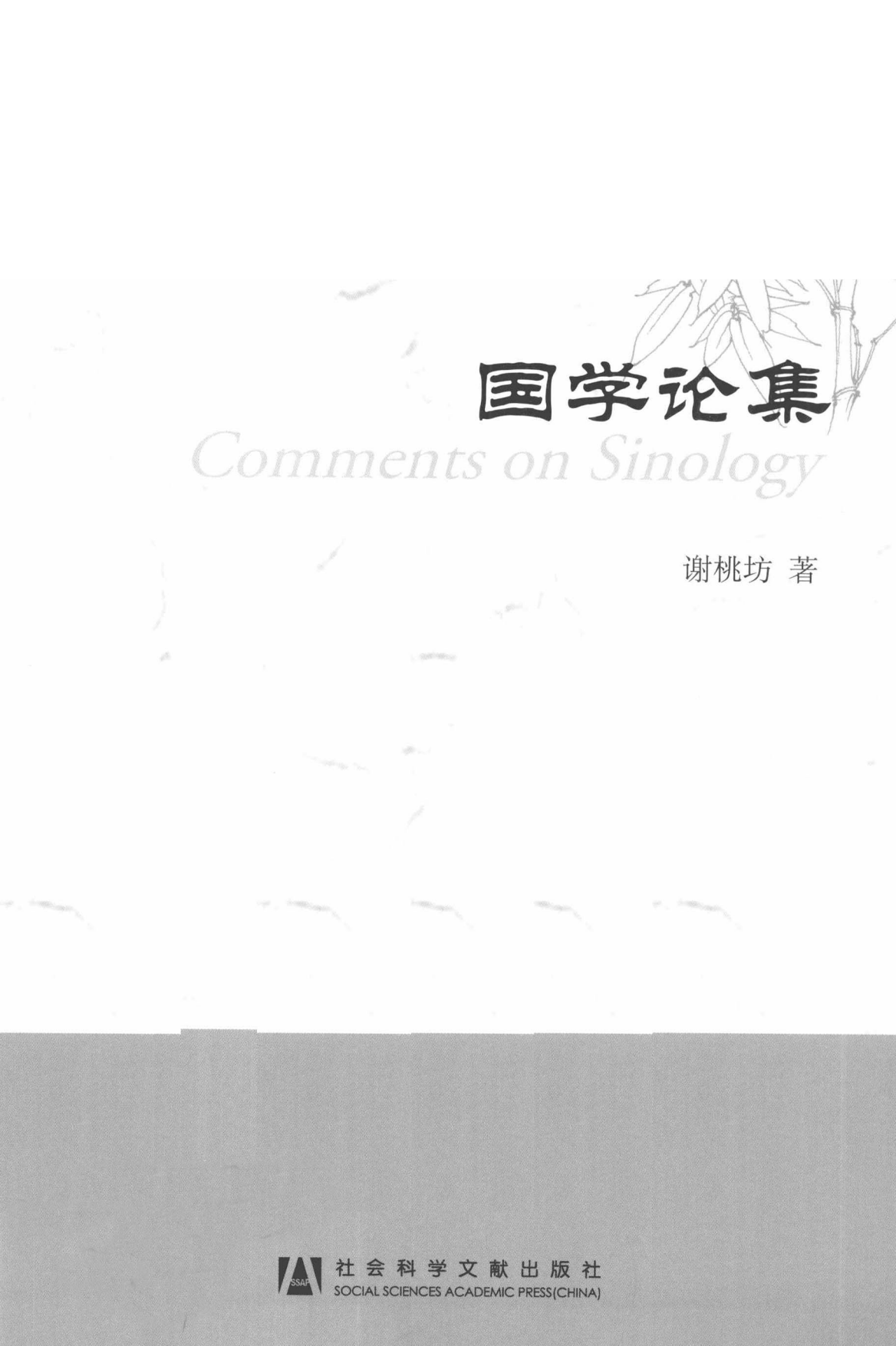
Comments on Sinology

谢桃坊 著

国学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的高深而烦琐的考证，它是独立而纯粹的学术，不承担其他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的任务。国学的成果有助于促进中国各种传统学科的学术发展，为中国学术史提供真实而可靠的事实依据。国学研究的水平最能体现中华民族智慧和所达到的学术境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国学论集

Comments on Sinology

谢桃坊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学论集/谢桃坊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2
(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四川系列)
ISBN 978-7-5097-2667-9

I. ①国… II. ①谢… III. ①国学-中国-文集
IV. ①Z126. 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7516 号

· 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四川系列·

国学论集

著 者 / 谢桃坊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中心 (010) 59367127

责任编辑 / 吴 丹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责任校对 / 王红杰

项目统筹 / 邓泳红 吴 丹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3.5

版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字 数 / 394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2667-9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学术之爱 传承久远

(总序)

侯水平*

经过较长时期的酝酿和筹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终于就要面世了。

这部学术文库，承载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数十年来在学术之路上艰苦跋涉的思想印迹，是专家们上下求索的智慧结晶，是用生命做学问、用心血著文章的光荣见证。

学术何谓？古语云：“学术”乃“学问、道术”。这是一种字面的解释，而我更赞同这样一种说法：学术是学者的生命，是学者立身存世的唯一道理。“士大夫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当学者毕其一生之力，旨在于“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萃取思想之精华传之后世，则他的生命必将伴随他的思想获得永生。

而把学者们浸透生命和智慧的心血之作，精心存留和宝藏，用以昭示社会、启迪后人，则是我们编辑出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之良好愿望。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得以实现，真是一件令人无比欣悦的快事。在此，我要诚挚地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走过的三十多年风雨历程，既有坎坷颠簸的曲折，

* 侯水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亦有壮怀激越的豪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发奋图强，追求卓越。遥想当年，我们只是一个仅有几十人的哲学研究所，如今发展成一个拥有近 700 名正式职工、300 余名在读硕士研究生，学者云集，人文荟萃、学风浓炽，规模在全国位居第二的地方社会科学院，其中的沧桑巨变，令人不禁感慨万千！

我院现有 15 个研究所，研究领域涉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哲学、历史学、文学、新闻传播、管理学、图书情报与文献学、民族学、宗教学、人口学等多个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民商法学、区域经济学、巴蜀文化研究、文化发展学、产业经济学、康藏研究和灾难学等 8 个学科被省委宣传部批准为重点学科；中国发展新闻学、党建与基层治理、现代服务业与市场体系、中国哲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俗文化与三国文化、农村现代化与社区发展、社会变迁、移民与客家文化、环境经济学、人口与劳动经济学等被确立为院优长学科。在巴蜀文化研究、康藏问题研究、客家文化研究、文艺学研究、钱学研究、词学研究、三国文化研究、三星堆研究、农村经济研究、法学研究、道教文化研究、人力资源研究、教育学研究等领域，我院具有鲜明特色和明显优势。我院还有 1 个研究生学院，拥有 5 个一级学科，44 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一个博士学位授权，以及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我们还主办了《社会科学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经济》、《中华文化论坛》、《中国西部》等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和全国公开发行的经济专业大报《经理日报》，创办了“四川社会科学在线网”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网”两个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门户网站。

三十多年来，我院会聚和培养了大批优秀科研人才，神话学家袁珂、经济学家林凌即是杰出代表。专家学者笔耕不辍，凝结出累累硕果。这些研究成果既关乎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也涉及理论前沿和学科建设的众多领域。从历史到现实，从实践到理论，从重大问题到热点难点，从规划方案到决策咨询，从学科建设到理论创新，涉猎既广，钻研犹深。既有载誉全国的大型理论专著《毛泽东思想史》、《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实践与创新》、《邓小平理论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也有充分反映地方文化特色的《四川通史》、《巴蜀文化通史》、《巴蜀文化



系列丛书》、《巴蜀文化研究丛书》、《全蜀诗》、《巴蜀艺术丛书》、《客家文化研究丛书》等；还有具有学科开创意义的《中国神话史》、《环境经济学》、《中国发展新闻学》等。此外，我院专家学者还屡屡在《中国社会科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等全国权威报纸杂志发表论文，不断在全国最前沿的学术阵地上发出我们洪亮的声音。

近年来，我院加强了应用对策研究，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确立研究课题，以我们对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持续深入关注，发挥省委、省政府“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我们在“西部大开发研究”、“三个转变研究”、“四个跨越研究”、“成渝经济区研究”、“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可行性研究”、“城乡统筹发展研究”、“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研究”、“市州发展战略规划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产生了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逐渐树立和形成了良好的智库品牌。

本系列学术文库正是我院众多优秀成果的代表，她既体现了我院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实践的精神和理念，也体现了我院专家学者传承文明、弘扬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书中所存留的，既是专家学者们用心结撰的心血之作，更是我院在三十多年中所形成的优良学术传统，这种学术传统，存在于专家学者们对学术的深沉热爱，以及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坚守之中。

当曾经被珍视的传统和价值被急功近利消解的时候，我们的专家学者，仍用他们对学术的坚守，践行着对生命的承诺，不虚妄不矫饰，执著信念，呕心沥血，只为萃取思想之精华，只为让学术远离浮华和喧嚣，回复最初的纯洁和美好。

我们的专家学者对学术的热爱，理当受到尊敬和铭记，他们的学术信仰和传统，也理当被发扬光大，传承久远。

我相信，这部学术文库的诞生，必将成为一座学术高峰，成为我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标志与象征，我们未来所要做的，就是沿着它立定的高度，不断地攀登和超越。

我相信，学术的神圣和崇高定能带给我们更多的安宁和幸福。

自序

我在 20 岁时由爱好文学创作转向哲学社会科学，因而 1956 年以同等学力报考高等学校时第一志愿是哲学系，但限于我只能选择本区的师范院校而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国语文系。我入学后志于文学批评，以满足对哲理与文学的兴趣。1957 年由于政治命运的改变，遂走上纯学术的道路，以词学研究作为治学的方向。新时期以来，我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的夙愿终于实现。自 1981 年开始发表宋词研究论文，迄于 2007 年，这 17 年内我完成了一系列的词学论著，其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的论文集《宋词辨》和《词学辨》共收录论文 60 余篇。至此，词学研究可以暂告一大的段落。近年我国的国学热潮再度兴起，于是我投入了国学研究。按照我对国学的理解，它是对我国文献与历史上若干狭小学术问题进行科学的考证，这样实际上我的词学论文中的 20 余篇考证文章已属国学研究了。我之所以转向国学研究，一是因自来喜好博览而具有国学的基础，二是因它可以满足我对学理探索的好奇心理。当我有时完成了一篇较为满意的国学研究论文时，竟感到无比的欣喜与快意，这更增强了我的学术信心。我对国学的研究刚刚起步，我的某些见解虽然在当前的国学热潮中显得不合时宜，却自信其是有历史依据的，但愿它们能被理解。此集的其余两个部分，一是蜀学与理学，它们自然与国学的关系较为密切；一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仅选入了一些宏观的论文和市民文学的论文，而词学论文因已有专门的论文集，故不再收入。

蜀学的历史渊源甚早，但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应是近年新兴的，以四



川省文史馆与西华大学联合主办的大型学术辑刊《蜀学》于2006年的创刊为标志。我近年研究国学便涉及了蜀学，对它作了初步的理论探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川学术界出现了将原来考古学上的“巴蜀文化”概念无限扩张，甚而以之取代“四川历史文化”这个概念的现象，对此我是持异议的。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我关注的是宋代以来通俗的文学——宋词和市民文学所体现的反传统文化的精神。以上的观点是可以代表我的思想倾向的，即我虽然研究国故，但也希望从中寻求一种进步的人文传统并可以光照现代的思想价值，试图由此获得人生的信念。我特别珍爱这本集子，因它可以较全面地反映我的学术面貌与学术追求。

兹谨于此向支持此集出版的我院科研处表示感谢，亦向曾支持我的各杂志的编辑先生和关爱我的师友与读者们表示谢忱。敬祈学界师友与读者的校正。

谢桃坊

2011年于爽斋

目 录

自 序.....	1
论国学.....	1
学术的独立与自由问题	
——重读王国维纪念碑铭	14
评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与方法	21
批评今文经学派	
——刘师培在四川国学院	34
论刘咸炘的国学观念与学术思想	45
胡适开启国学研究的新方向	59
胡适的国学观念与其白话小说考证	71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85
科学的考据与从新的批判	
——郭沫若对国学运动的贡献	99
读经问题的历史反思.....	112
四川国学运动述评.....	118
古蜀史料辨伪.....	147



蜀学的性质与文化渊源及其与巴蜀文化的关系·····	160
论蜀学的特征·····	173
儒家与宗教	
——论西方的儒教观念及相关的问题·····	191
新儒学之创始与名义演变过程·····	206
新儒学派与传统文学观念之修正·····	220
关于苏学之辩	
——回顾朱熹对苏轼的批评·····	232
程颐蜀中行迹考·····	247
敦煌藏经洞之沙州都督府文献·····	257
略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考证方法·····	267
中国诗学辨	
——关于“诗学为何”答杨义与高建平先生·····	274
中国市民文学的发现与认识·····	289
明清时调小曲考原·····	299
论明清艳情小说的文化意义·····	314
中国近代禁毁小说戏曲的历史经验·····	325
附录	
学术论著目录系年·····	338
自传·····	348

论 国 学

自 1903 年中国国粹主义者们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1906 年章太炎在日本东京为中国留学生讲国学，到 1923 年胡适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研究国学的热潮从此在中国兴起。当时著名学者黄节、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胡适、顾颉刚等虽然对“国学”这一新的学术概念尝试作了简要说明，但没有一个说明能令学术界满意。1926 年顾颉刚谈到“国学”便以为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① 1928 年钱穆感叹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之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② 1993 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学研究》创刊，标志着国学的热潮再度兴起。然而国学是什么，即关于它在现代学科中的定位，它的研究对象和意义等问题仍使学者们感到模糊与困惑。在学术史上，某一新的学术思潮的性质有时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会被认识。国学作为一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它具有综合的特点，研究对象涉及极广泛的学术领域，学术结构层次复杂，因而我们现在若要推进国学研究，应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探讨，很有必要解决：国学是什么？

我们要回答国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确很困难。兹且先从 20 世纪 30 年代

① 顾颉刚：《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刊词》，《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第 175 页。

② 钱穆：《国学概论》卷首，商务印书馆，1956。



学术界关于《老子》成书年代的争论说起。1930年钱穆发表《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考察》，他认为：“从思想发展之进程言，则孔、墨当在前，老、庄当在后。否则老已先发道为帝先之说，孔、墨不应重为天命、天意之说。何者？思想上之线索不如此也。”^①此说一出，冯友兰、顾颉刚等表示支持，胡适则表示反对，于是开展了一场颇为激烈的论辩。1933年胡适发表《评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的长文，他表示：“我不反对把《老子》后移，也不反对其他怀疑《老子》之说。但我总觉得这些怀疑的学者都不曾举出充分的证据……我只能说：我至今还不曾寻得老子这个人或《老子》这部书有必须移到战国或战国后期的充分证据。在寻得这种证据之前，我们只能延长侦查的时期，展缓判决的日子。”^②胡适虽然对冯友兰和顾颉刚提出的证据进行了辨析而予否定，但仍谨慎地看待这个疑难的问题。钱穆晚年回忆，其论文在《燕京学报》刊出后，曾得到欧洲一位汉学家的赏识。这位汉学家说：“乃知中国学术问题，需由中国人自加论定，非异邦人所能为力也”^③。由此可见，像关于《老子》成书年代这类学术问题是令海外汉学家们每感无能为力的，它是中国学术中冷僻而又艰深的问题，只有依赖中国学者去解决。近年澳大利亚汉学家柳存仁谈及海外治中国学问时说：“研究传统的中国学问，就是在中国本土由有经验的中国学者们努力爬罗剔抉，在前人的业绩上去芜存菁，希望能够在在一个可以预计的时间内，在某一方面做出一点成绩来，原就也非易易；何况僻居海外，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里，图书度藏，既不敢说是完备，师友切磋，往往也只限于少数常见面的人，比起庄子说的‘旧国旧都，望之畅然’，那真是相去很远的了。”^④关于中国的某些困难的学术问题的研究，这是中国学者特具的优势，而且是能在世界汉学中居于领先地位的。1923年1月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国学时，将中国文化比喻为一个丰富的矿藏，他提出建议：“我们感觉着有发起一个合作运动之必要，合起一群人在一个共同目的的共同计划之下，各人从其性之所好，及平时的学问根底，各人分担三两门做‘窄而深’的研究，拼着一二十年的功夫下去，这个矿或者可以开得

① 钱穆：《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考察》，《燕京学报》1930年第7期。

② 胡适：《胡适文集》（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02页。

③ 钱穆：《师友杂忆》，岳麓书社，1986，第135页。

④ 柳存仁：《海外治中国学问》，《文献》1988年第3期。



有点眉目了。”^① 胡适 1924 年 1 月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班讲演时特别强调说：“我国各种科学莫有一种比得上西洋各国，现在要办到比伦于欧美，实在不容易，但国故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总该办起来比世界各国好。”^② 梁启超和胡适都是针对治国学的学术意义而言的。他们都注意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存在一种专门的学问，大抵就是后来所说的“国学”，但对其性质尚不能确切把握。

我们考察国学运动期间发表的重要论著的倾向，便可发现它们具有一种共同的学术性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学者们的论著有段颐的《黄河变迁考》，吕大恒的《诗书中之联绵字之研究》、方勇的《说文读若考》、李正奋的《魏书源流考》、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此外，如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生霸死霸考》、《明堂庙寝通考》、《汉魏博士考》、《鬼方昆夷猃狁考》、《西胡考》，梁启超的《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荀子评诸子语汇释》、《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考》、《印度史迹与佛教之关系》，胡适的《西游记考证》、《红楼梦考证》、《陶弘景的〈真诰〉考》、《醒世姻缘传考证》、《参同契的年代》、《蒲松龄的生年考》、《考范缜发表〈神灭论〉在梁天监六年》，顾颉刚的《郑樵著述考》、《〈尧典〉著作时代考》、《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这些论著所探讨的是中国学术的颇为细小的问题，它们涉及中国的经部、史部、子部和集部的典籍，采用传统的考据方法以作极深入的专门问题的研究。梁启超于 1923 年曾提出建立中国古典考释学的设想，他说：

我们因为文化太古，书籍太多，所以真伪杂陈，很费别择，或者文义艰深，难以索解，我们治国学的人，为节省后人精力，而且令学问容易普及起见，应该负一种责任，将所有重要古典，都重新审订一番，解释一番。^③

关于这种研究，他要求学者以很谨严的态度去辨识古典文献的真伪，破除前人的误解；只能选择自己最适宜的专门学问，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

① 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三九，中华书局，1936，第 110 页。

② 胡适：《再谈谈整理国故》，《胡适文集》（1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 94 页。

③ 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三九，中华书局，1936，第 112 页。



研究，体现出广博的知识。而且要注意所研究的学问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所研究的问题与其他各方面的关系。梁启超的意见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他已认识到国学研究的特殊性，试图以“古典考释学”代替“国学”。1932年北京大学研究院成立，将原来的研究所国学门改名为研究院文史部，研究方向以中国古代语言、文学、历史、思想史、社会制度的研究为主。这是一个学术思潮转变的标志，学术界立即有所响应：1933年6月国立暨南大学出版《文史丛刊》，1935年3月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出版《文史汇刊》，1935年7月安徽大学文史学会出版《安大文史丛刊》，1941年1月重庆文史杂志社创办《文史杂志》。“文史”的含义是什么呢？1946年10月16日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创刊，胡适发表《〈文史〉的引子》以表明办刊宗旨：

《文史》副刊是我们几个爱读书的朋友们凑合的一个“读书俱乐部”。我们想在这里提出我们自己研究文史的一些小问题，一些小成绩……我们用“文史”一个名词，可以说是泛指文化史的各方面。我们当然不想在这个小刊物里讨论文化史的大问题，我们只想就各人平日的兴趣，提出一些范围比较狭小的问题，做一点细密的考究，寻求一些我们认为值得讨论的结论……文史学者的主要工作，还是只寻求无数细小问题的细密解答。^①

文化史的研究是讨论重大的学术思想问题，文史研究是对文化史上狭小问题作细密的考证，特别注重证据。此后胡适没有再谈国学研究，而是谈文史考证了。1952年他谈到治学方法时说：“我认为作文史考据的人，不但要时时刻刻批评人家的方法，还要批评自己的方法，不但要调查人家的证据，还要调查自己的证据。”^②这对我们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新中国建立后，学术界虽然在新的学术思想指导下继续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但“国学”的概念消失，没有谁再谈它了。“整理国故”为“古籍整理”所取代，“国学”则为“文史”所取代。1962年10月《新建设》编辑部主编的、中华书局出版的学术性专刊《文史》第一辑问世，卷首的《编

① 胡适：《胡适文集》（1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784页。

② 胡适：《治学方法》，《胡适文集》（1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42页。



者题记》云：

《文史》所收辑的文章大抵偏重于资料的考据。学术研究是一个认识过程，积累资料和辨析资料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步。大量占有资料，才能使研究工作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考据就是对资料进行鉴别，去伪存真，辨其精粗美恶……《文史》准备收辑研究我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和某些科学技术史等方面的文章。^①

关于文章的范围则有以考据为主的专题研究，稀见资料的整理，古籍某些篇章的笺释训诂，文献研究的论文，以及从资料与考证角度作的书评等。《文史》第一辑的要目有：段熙仲的《礼经十论》、汤炳正的《〈屈原列传〉新探》，周清澍的《成吉思汗生年考》、张德钧的《梁启超论谭嗣同事失实辨》、湛之的《高明的卒年》、庞朴的《告子小探》、杨宽的《后期墨家世界观及其与名家之争》、朱谦之的《王充著作考》、学初的《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问题》。同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的《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出版，编例云：

目的在于联系团结研究文史、整理古籍的专家学者交流心得和创见……刊登研究我国古代近代历史、古典文学以及古籍和古籍整理工作的专门论著为主。^②

《论丛》第一辑的要目有：平心的《卜辞金文中所见社会经济史实考释》、蒙文通的《略论〈水经注〉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朱季海的《楚辞解故》、陈奇猷的《黄钟管长考》、丘琼荪的《汉大曲管窥》、唐长孺的《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俞平伯的《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后记》。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史》和《中华文史论丛》仍然保持了最初的办刊宗旨，而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国学研究》亦继承了《国学季刊》的学术传统。我们若将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论文、60年代《文史》与《中华文史论丛》的论文，同现在的《文史》、《中华文史

① 《文史》第一辑，中华书局，1962。

② 《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



论丛》和《国学研究》的论文相比较，可以发现它们都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献等方面狭小而专门的难题，在占有翔实的资料的基础上，采取传统的考据方法作细密而科学的研究。因此，我们可以说：国学研究与文史研究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只是因时代学术观念的变化而出现的不同名称而已。

—
—

我们追溯以考证的方法解决中国文献与历史上狭小而疑难的问题的文史研究，它是继承了清代考据学——朴学传统的。清代初年顾炎武、阎若璩、黄宗羲开创的考据学，在乾嘉时期经惠栋、戴震、江永、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学者的发展而形成一学派。他们治学凡立一义必凭证据，证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罗列事实进行比较，为窄而深的研究，表述方式朴实简洁。梁启超说：“当时学者，以此种学风相矜尚，自命曰‘朴学’。其学问之中坚则经学也，经学附庸则小学；其次及于史学、天算学、地理学、音韵学、律吕学、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等等，一皆以此种研究精神治之。质言之，则举凡自汉以来书册上之学问，皆加一番磨琢，施以一种组织。”^① 我们如果再追溯清代考据学的渊源，则它是北宋学者们疑经疑古而针对中国古代文化若干问题的辩证而兴起的一种学风。欧阳修在《集古录》里对金石碑刻文字的考证，可与史传正其阙谬。沈括的《梦溪笔谈》有两卷辩证，对古代丧服、乐律、地名、官职等作了简要考述。南宋王灼的《碧鸡漫志》、程大昌的《演繁露》、袁文的《瓮牖闲评》、王楙的《野客丛书》、戴埴的《鼠璞》、叶大庆的《考古质疑》、王应麟的《困学纪闻》，皆以考据见长。胡适说：

这种考证方法不用来自西洋，实系地道的国货，三百年来的考据学，可以追溯至宋，说是西洋天主教耶稣会士的影响，不能相信。我的说法是由宋渐渐的演变进步，到了十六世纪，有了天才出现，学问发达，书籍便利，考据就特别发达了。^②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商务印书馆，1944，第29页。

② 胡适：《考证学方法之来历》，《胡适文集》（1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12页。



虽然中国的这种考据方法渊源较早，但自国学运动以来，学者们继承传统朴学时又吸收了西方近代的实证方法，因而出现了许多关于中国古代文献与历史问题的专题研究，方法更为细密，材料的搜集更为广泛和丰富，推理与求证的过程采用了严密的逻辑程序，所以取得的成就亦大大地超越了前人。这种文史研究能否成为一门学科呢？

以考证方法研究中国文献与历史的问题，它具有综合性质，是与中国学术的综合性特点相适应的。从《老子》、《论语》、《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论衡》到《明夷待访录》，它们的内容极为广博，涉及了多种学科，具有综合性质。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柳存仁说：“中国传统的著作综合性占优势，和古代书籍的体制不无关系。但是我们传统的做学问的方法也能够从博览入手，这也许跟我们悠久的历史，汗牛充栋的著作把许多类似或看似相关的事物、观念很容易地都打成一片也不无关系。”^① 中国学术的综合性与西方学术的分析性是相异的。现代中国治哲学、历史、文学的学者往往感到文史哲是不能严格分家的，总是存在一种交互的关系。国学兴起之初，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中国学术综合性研究的一种趋势，以克服现代学科细致分类后出现的新的弊病，即按照某一学科观念出发而不能解决中国学术的一些复杂的边缘的问题。从国学思潮的产生，整理国故的进行，文史研究的开展，考据方法的提倡，到近年国学热潮的再度出现，经历百年的努力，国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国学是以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与历史中存在的狭小的疑难的学术问题为对象；这些问题虽然狭小，但只有具备关于中国文化的广博知识，采用传统的考据方法才有可能解决；它是一个关于中国学术综合性的，涉及哲学、历史、地理、文学、文字、音韵、文献、版本、校勘、训诂等的边缘性学科；它即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史研究”。这门学科是颇为特殊的，而确又为中国学术发展所必需的，也是其他各个学科不可能代替的。

近年学术界谈论“国学”，发表“国学宣言”，或者举办“国学研讨会”时，难以确定内涵，歧义杂出，甚至感到迷茫，其原因在于缺乏学科观念，而又将学术研究、研究基础和普及工作予以淆混，不分层次所致。对于中国古代文献与历史上存在的问题或中国学术史上存在的狭小问题的研究，这是国学的本体。因国学是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关于它的基础则是

^① 《文献》1988年第3期。